

# 從同治醫案論清宮脈案的性質

張哲嘉\*

研究醫史的學者不曾聽過古時病人呻吟的哀聲，也沒有嚐過前代名醫調理的藥味。醫史家主要依賴目擊者留下的文字記錄來了解歷史上的醫療。研究方法有如以筌蹄求魚兔。儘管由於前輩的努力，我們已經捕得了不少魚兔，然而現在是否已經到了可以忘筌棄蹄的時候呢？

時機恐怕還沒有到，儘管醫史家對手上的筌蹄始終不曾完全滿意過。以研究中國醫史的史家而言，現存浩若煙海的醫案仍是了解醫療最重要的資料。然而醫案的問題卻也有目共睹：醫案中的患者很少有自己的意見，大多是順從接受醫生的診治。偶而也有少數病人拒納醫生的建議，總是落得悲慘病卒的結局。此外，醫案中醫生幾乎沒有失手的時候，<sup>1</sup> 很難讓人相信醫案忠實地記錄了醫療的實況。但讀者又不容易實指醫案的創作過程有什麼問題。另一方面，由患者或同情患者觀點來看醫療過程的記錄，總數雖亦可觀，但分佈極其零散。而這類記敘大多不如醫案般有系統，其價值也不免因此打了折扣。本來醫生以外作者的記錄是

---

\* 美國費城賓州大學博士。

<sup>1</sup> Joseph Needham & Lu Gwei-djen,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Vol. 6, Part 6, 頁 73-74 (即將出版)。

## 2 「中國十九世紀醫學」研討會

---

補充醫案最佳的參考資料。卻因記敘的不周全、以及鮮有適當醫案與之相應等缺點，他們的觀點很難有發揮作用的機會。既然所有的筌蹄都有明顯的漏洞，我們怎麼能確定是不是有些原來可以捕到的魚兔趁罅逃脫了？我們又怎能繼續只是承認漏洞的存在，卻不開始動手修補呢？

本文使用一個恰好醫／患觀點都能適度展現的機會，討論醫案等醫療記錄的性質與問題。原來我們只能用一種資料來了解醫療。現在我們雙方的觀點都能掌握，可以建構一個完整的醫療過程。本文將呈現若干只用一種資料時無法得到或確定的結果。本文將討論什麼地方須得各種資料合參才可能看出來的，這些地方是否單看某種資料永遠也看不出來，又各資料有什麼優點。藉以探析學者尚未及深入探討的醫療記錄的性質。如此不但可修正利用醫療記錄研究醫療的角度，而且亦將深化對記錄作者的了解。

所選擇的案例是同治皇帝逝世前、從病發算起三十七天間的醫療。今日北京故宮仍然完整保存著這段期間醫生對皇帝診治的脈案。皇帝的老師的翁同龢( 1830-1904 ) 的日記也記錄了診療期間患者以及同情患者的旁觀者的觀點。此外，由於皇帝特殊的身份，不乏國史私乘可以補充背景及幫助澄清醫、患雙方記錄中均晦而不顯的史事。據此以下將先依上述理則，先綜合這些史料敘述出一段故事，而後以此為基礎展現翁同龢日記與脈案的若干特性，結果將有助於了解晚清宮廷醫療的實況與清宮脈案性質。

### 同治帝的天花之喜及其『康復』

同治十三年，皇帝時年十九。十月二十九日皇帝巡幸北京西郊的西苑以後，就感覺身體不舒服。由太醫院左院判（相當於第一副院長）李德立、右院判（相當於第二副院長）莊守和主治。<sup>2</sup> 起初診為受涼。次日改判為發疹。十月三十日

---

<sup>2</sup>當時編制上正式的長官院使（相當於院長）有缺未補，所以左院判是太醫院當時最高負責人。由於清代太醫院的特殊背景與制度，院內階級森嚴。形成以下屬絕對服從長官為模

申時（午後三至五時）證實為天花。宮中對這個診斷結果高度重視。皇帝雖然名義上仍舊躬親視事，但是馬上令大臣李鴻藻代替皇帝批改奏折，好讓皇帝有空善加休養。<sup>3</sup>

天花是全人類最可怕的疾病之一。數千年來人類逐漸累積了若干醫療經驗對抗天花的侵襲，但是在英人勤納發明牛痘法推廣全世界之前，這些經驗的治癒力都還很有限。無助之餘人們乞靈於鬼神，許多民族的信仰中有一個專司天花的神祇。成為醫療史一個有趣的課題。滿洲人對於天花尤為恐懼。<sup>4</sup> 在滿洲傳統的民間信仰中，主管天花的女神『阿拉哈媽媽』的級別僅次於地位最高的三位女神。滿洲人對天花的重視於此略見一斑。<sup>5</sup> 學者對於阿拉哈媽媽所知尚少。而由於阿拉哈媽媽的漢譯與漢人司天花的女神『痘神娘娘』同名。我們很難判定入關後滿人所祭祀的痘神娘娘是本族的還是漢族的神明，又崇拜的方式是否曾混合了滿漢的習俗。<sup>6</sup>

有一種特別的祭拜痘神娘娘的方式，到目前為止似乎只在與漢族旗人與滿族之間發現。在學者認為是描寫旗人貴族生活的小說《紅樓夢》的第二十一回裡，<sup>7</sup> 當賈家的一個小女孩得了天花，賈府馬上請了痘神娘娘在家中供奉了十二天。十二天內天花痊癒，就在滿十二天當日送神離府。<sup>8</sup> 像這樣請神到家、十二日之後送神離開的方式在非旗籍的漢人間尚未見明確記載。<sup>9</sup> 類似的例子只在一個滿洲

---

式的全院共榮共生的整體。見拙作博士論文第二章。故此時名為二人共同醫治，實為位階較高的李德立主持決策以及脈案的撰寫。

<sup>3</sup> 《大清穆宗毅皇帝實錄》，卷 377，頁 21 下-22 上。

<sup>4</sup> Chang Chia-feng 張嘉鳳，AspectsofSmallpoxandItsSignificanceinChineseSociety(英國倫敦大學博士論文，1996),p.171。

<sup>5</sup> 富育光、孟慧英，《滿族薩滿教研究》（瀋陽：遼瀋書社，1992），頁 102；嵇浩存、何青劍主編，《中國各民族與神話大詞典》（北京：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頁 398。這兩本書明確指出了天花在滿洲信仰的重要性，只可惜並未對崇拜方式詳加說明。

<sup>6</sup> 如葉大兵、烏丙安認為痘神娘娘是滿、漢兩族共有的神明，但並未提到或說明阿拉哈媽媽的問題。見葉大兵、烏丙安合編，《中國風俗辭典》（北京：長城書社，1990），頁 778。

<sup>7</sup> 余英時《紅樓夢的兩個世界》（台北：聯經出版社，1987），頁 241。

<sup>8</sup> 《紅樓夢》（台北：三民書局，1993），頁 109。陳勝崑特別注意到《紅樓夢》與清宮治痘方式的類似。見陳勝崑《醫學、心理、與民俗》（台北：健康世界出版社，1982），頁 82。

<sup>9</sup> 李汝珍的《鏡花緣》中也有有關祈求痘神娘娘保佑天花痊癒的記載。然而祭拜的方式並

家庭——滿清皇室中發現。

儘管擁有最豐裕的醫療資源，清朝皇室對天花的恐懼不下於其滿族同胞。<sup>10</sup> 同治的七世祖順治皇帝就是死於天花。<sup>11</sup> 據說清廷決定順治的繼承人時選擇了後來的康熙皇帝的原因，即因他已經出過痘，已經終生對天花免疫。<sup>12</sup> 基於此教訓，康熙日後不遺餘力推廣人痘法對抗天花的威脅。<sup>13</sup> 雖然收到一定程度的效果，顯然並未能完全控制。康熙推行種痘法之後仍然有若干皇子、公主死於天花。<sup>14</sup> 而且清廷還特別規定滿洲、蒙古侍衛官員有未經出痘的子弟都可以申請太醫院醫生協助種痘，理由是『滿洲、蒙古等艱於子息者，大都為出痘所殤』。<sup>15</sup> 在中國歷史從來沒有一個特定的疾病受到朝廷如此高度的重視。

儘管天花是這麼可怕，但是當一個人得了天花的時候，至少以《紅樓夢》與清宮中的習俗，親友得給他賀喜。理由是一個人發過一次天花後即終身免疫，一旦痊癒了就等於是逃過一劫，豈不可喜？所以不管結果如何，親友要先把這件事當作喜事，好討個吉利口彩。<sup>16</sup>

職是之故，當李德立在十一月一日宣布同治皇帝得了天花的時候，朝廷是把這件事當作喜事來辦的。依據宮廷傳統，在感染天花起十二天之內算是喜期。<sup>17</sup> 在

---

不一樣。此點可由人物對話中『家中那【哪】得如此？』可知。見《鏡花緣》（台北：三民書局，1974）第五十五回，頁268。

<sup>10</sup> 清初肅親王豪格可資一例。當其政敵多爾袞準備要派遣他征討南方的時候，豪格認為這個決定是一種政治謀殺。他說：『我未經出痘，此番出征令我同往，豈非特欲致我死乎？』見《大清世祖章皇帝實錄》（台北：華文出版社，1964），卷4，頁2下。

<sup>11</sup> 吳相湘〈天花與御醫〉，收在吳相湘《晚清宮廷與人物》（台北：文星書局，1964）頁18-19。

<sup>12</sup> 魏特著，楊丙辰譯《湯若望傳》（台北：商務印書館，1949），頁325-326。

<sup>13</sup> 張嘉鳳〈清康熙皇帝採用人痘法的時間與原因試探〉，《中華醫史雜誌》26：1（1996），頁30-33。

<sup>14</sup> 可以確認的例子見陳可冀主編，《清宮醫案研究》（北京：中醫古籍出版社，1990），頁783-785;812-813;834-845。

<sup>15</sup> 徐藝圃〈同治帝之死〉，收在《清宮醫案研究》，頁2246。

<sup>16</sup> 高陽，《清朝的皇帝》（台北：風雲時代出版社，1990），頁1136。

<sup>17</sup> 依照清宮檔案中現存咸豐還是四阿哥時的天花脈案，由於病情發展順利，醫生張宗漣於病起六日，就先行預言可以在「十二朝吉期，遵例送聖上順大喜。」可見定天花發病為

這段時間內大臣都要依規矩穿『花衣』，亦即蟒袍上朝；奏摺一概照喜期規矩用黃面紅裡；此外還要照滿洲賀喜的習慣向皇帝呈遞如意，道賀他得了天花。<sup>18</sup>

作為皇帝的老師，翁同龢很關心自己學生的病情。由於他與皇室的私人關係，他被特准每天可以到宮裡的內奏事處閱讀前一天醫生診斷的脈案。他也有權向主治皇帝的大夫、以及主管宮廷事務的內務府大臣徵詢有關皇帝的最新病情。

在天花初起前幾天皇帝的病情發展並不順利。除了發高燒以外，而且口渴腰痛。這些都是典型的天花症狀，只是皇帝的病情似乎比一般更為嚴重些。此外，痘色『紫滯乾艷』。如據太醫院的教科書《醫宗金鑒》所載，這樣的症候屬於逆證。<sup>19</sup>因此，李德立於十一月二日的脈案中寫著『勢屬重險』。<sup>20</sup>所採的對策是『方用涼潤』。<sup>21</sup>

經過御醫的兩天悉心調養之後，皇帝的病情開始有了起色。翁同龢在日記裡表示對此『欣忭無已』。<sup>22</sup>十一月五日，痘色有由紫轉白的跡象，這是個好兆頭。<sup>23</sup>十一月七日御醫終於在脈案中表示了掌握病情的自信。李德立寫著：『初起險症，尚喜，化險為平。』然而他並不急著把話說滿。他留下了一個但書：『若得腎精不動，咽胸漸寬，則可保化順之喜。』<sup>24</sup>

由於諸大臣每天閱讀脈案，一當御醫漏出口風表示病情回穩了，他們就請求晉見皇帝。<sup>25</sup>十一月八日上午約十點鐘，皇帝在兩宮太后的陪同之下於養心殿接見群臣。這是他染上天花後第一次與大臣見面。這次見面的重要目的之一是要讓大家親見皇帝的病狀。兩位太后在皇帝身旁拿著蠟燭幫助照明，令眾臣上前看皇帝的出痘的情形。而皇帝則伸出雙臂任眾人觀看。翁同龢記載當時他親眼看到皇

---

十二日是一個慣例。此處『聖』指痘神娘娘。見《清宮醫案研究》，頁 784。

<sup>18</sup> 《翁同龢日記排印本冀排印本附索引》（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頁 761。

<sup>19</sup> 《醫宗金鑒》（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70），頁 1435。

<sup>20</sup> 《清宮醫案研究》，頁 1349。

<sup>21</sup> 《翁同龢日記排印本冀排印本附索引》，頁 761。

<sup>22</sup> 前揭書，頁 762。

<sup>23</sup> 《醫宗金鑒》，頁 1435。

<sup>24</sup> 《清宮醫案研究》，頁 1352。

<sup>25</sup> 《翁同龢日記排印本冀排印本附索引》，頁 762。

帝的天花。同治似乎極為疲倦，他躺在御榻上，『偃臥向外，花極稠密。』<sup>26</sup>

群臣看過皇帝後隨即退下。但旋即又被召回。這時同治已經被移到內殿休息，在養心殿上的只有太后而已。慈禧這時開口說話。<sup>27</sup> 她向群臣表示，皇帝既然一時因病無法躬親政務，眾臣應該公議出一個辦法解決這個問題。群臣明瞭慈禧的意思是想要代掌國政，就呈奏一切應該請旨之事暫時都請太后訓諭。然而慈禧並不馬上接受這個建議。她回答群臣茲事體大，群臣須得向皇帝當面請示，要皇帝同意了才行。所以他們又約定次日再見皇帝一面完成以移交政權的手續。<sup>28</sup>

在這天之前天花最凶險的時期似乎已經過去；皇帝的病情也已控制住。李德立與莊守和決定要轉方補益皇帝的元氣。根據翁同龢的了解，十一月八日醫生們大致停用原來的涼藥，而改採補氣的策略。<sup>29</sup> 清宮檔案的內容支持翁同龢的說法，從八日起數日之內，李德立都宣稱他的意圖是要為病人『保元』或『補氣』。<sup>30</sup>

李德立的藥馬上見功。次日當皇帝再見群臣的時候他的精神明顯地較昨日充沛。當早上七點十五分當群臣進殿的時候，皇帝已能起身坐在御榻上。翁同龢描述他『氣色皆盛，頭面皆灌漿飽滿，聲音有力。』同治表示即使天花痊癒，他需要休養一百天才算妥當。在這段時間內他同意由皇太后全權代理政務。此外，同治又一次伸出臂膀讓大家看他飽足的天花顆粒，表示他的病情發展順利。翁同龢感到非常高興，他『不勝喜躍而退。』<sup>31</sup>

由於『保元』或『補氣』的療法收功，李德立此後數日逐漸增加劑量。皇帝除了虛弱、不寐等症候並未根除外，健康狀況大體上漸趨佳境。<sup>32</sup>

慈禧此時對於同治的病情頗為樂觀。這可由兩件事上看得出來。首先，她在

---

<sup>26</sup> 同上。

<sup>27</sup> 據蕭一山對翁同龢日記的解讀，當時說話的係慈禧一人。見蕭一山《清代通史》（台北：商務印書館，1967），頁 670。

<sup>28</sup> 《翁同龢日記排印本冀排印本附索引》，頁 763。

<sup>29</sup> 同上。

<sup>30</sup> 《清宮醫案研究》，頁 1352-1355。

<sup>31</sup> 《翁同龢日記排印本冀排印本附索引》，頁 763。

<sup>32</sup> 《清宮醫案研究》，頁 1353-1354。翁同龢也在十一月十日記同治的病情發展『可慶也』。見《翁同龢日記排印本冀排印本附索引》，頁 763。

十一月十二日宣布次日她要將大光明殿的痘神娘娘迎請到宮中，祈求娘娘保佑皇帝渡過難關。這樣的祭拜方式與咸豐皇帝幼時得天花時以及《紅樓夢》中所記有關痘神娘娘的儀式幾乎如出一轍，都是把娘娘請到家中供養。唯一的不同是，二者是在醫生剛證實是天花就請神到家，然後在病人康復後、待日期一滿了十二天就送神離開；<sup>33</sup> 而慈禧則是在同治得了天花的第十三天才提起要請神。似乎慈禧是先對送神典禮的圓滿與風光有信心，才願意將請神一事付諸行動。證諸當時的脈案，慈禧有理由有這樣的把握。當時的民間對慈禧這一反常的舉動也存著如此的看法。根據在浙江發行的《萬國公報》，在慈禧才宣布請神的當天，就有人從北京發了一封快信給浙江的編輯，說是皇上的病要痊癒了。<sup>34</sup> 可見當時人們對於皇室請神一舉，也是做這樣的解讀。

此外，她另宣布同治的主治大夫李德立、莊守和分別以三、四品京堂資格候補。這也是不次的拔擢。<sup>35</sup> 太醫院的醫官做到頂也只是正五品。而當時李、莊二人都只是正六品。這個特旨讓李德立連升六級、莊守和連升四級。如果慈禧不是認為李、莊治好了同治的病，而只是要激勵他們的話，沒有必要這麼早給他們過重的獎賞。

翁同龢並不像慈禧那麼樂觀。他仍然每天細心閱讀脈案。十一月十二日那天，他發現了李德立忽然換掉了主藥之一的肉桂，而且一口氣加上了桂枝、延胡索、青皮、三仙四種利氣破滯的藥材，他稱其治則為『保元』、『調氣』。固然藥、症相符，但翁同龢對為何一日之內做這樣大的變動感到非常奇怪。在這天的日記他記下：『不識其故。』<sup>36</sup>

此後李德立的用藥陸續做更大的變動。他減少鹿茸等溫補藥，而開始雜用如麥冬等涼藥。逐漸遠離前數日用重劑溫補的路線。到了十四日，所用的多是一派『涼血發散』的藥品。<sup>37</sup> 後世史家看這段時間的用藥，多批評李德立涼熱雜投，毫

<sup>33</sup> 《紅樓夢》，頁 109；《清宮醫案研究》，頁 784。

<sup>34</sup> 《萬國公報》（台北：商務印書館影印，1968），卷 1，頁 547。

<sup>35</sup> 《越縵堂日記》（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1963），頁 4040。

<sup>36</sup> 《翁同龢日記排印本冀排印本附索引》，頁 764。

<sup>37</sup> 前揭書，頁 765。

無章法。<sup>38</sup>儘管如此，皇帝的病情既未明顯進步，卻也沒有惡化，呈現著似乎是穩定的狀態。痘痂也漸漸剝落。十一月十四日，李德立在脈案中特別解釋先前用了若干溫補的峻劑，那是因為要消除痂結外的腐爛的權宜之計。很幸運地並未對病人帶來任何後遺症。現在他終於可以向大家宣稱皇帝的身體已經又『化險為平』了。<sup>39</sup>

儘管李德立並未在脈案中明言，但就朝廷的理解，皇帝的天花已經算是痊癒了，所剩的只是預後的休養而已。十四日當天慈禧先是給諸天神加封尊號，以酬謝他們庇佑皇帝的功德。次日更正式以皇帝名義下了一道上諭昭告天下現在的身體狀況已經『諸臻康吉』。群臣都進如意向皇帝道賀。皇帝也大沛恩綸，除兩宮皇太后崇上徽號以外，嬪妃、宗室、京內外官員、乃至於京師各營士兵都有封賞，連囚犯也得到減刑。唯一不改變的是大臣仍舊穿花衣上朝。慈禧下令要繼續穿到來年的二月十一日，也就是從皇帝感染天花算起，需要休養百日屆滿之期。<sup>40</sup>

慈禧並沒有忘了要把痘神娘娘從禁宮送回天上，因為她已經達成了她的任務。大約在下午兩點鐘，送神隊伍把娘娘從養心殿送到紫禁城正門的大清門外舉行送神典禮。為了要送娘娘上天，典禮中燒了九隻紙做的大龍船，還燒了很多采帛車馬作為謝禮。這個儀式很像是滿洲喪禮送亡靈歸天中的「大送祖」。據目擊者李慈銘所記，當時旁觀的很多人都竊竊私語，以為是一個不祥的徵兆。<sup>41</sup>

---

<sup>38</sup> 吳相湘〈天花與御醫〉，《晚清宮廷與人物》，頁 21。其後陳勝崑、高陽均承襲吳相湘的看法。

<sup>39</sup> 《清宮醫案研究》，頁 1355。

<sup>40</sup> 《大清穆宗毅皇帝實錄》，卷 375，頁 14 上。

<sup>41</sup> 《越縵堂日記》，頁 4040。



## 同治的天花預後及其崩殂

儘管慶祝大典已經完成了。翁同龢還是不放心皇帝的病，第二天他依舊到內奏事處去看前一天的脈案。然而在該處供職的太監告訴他沒有脈案，也毋須請安。這與他所了解的皇帝病情不符。回程中他遇見了他的好朋友榮祿（1836—1903）。榮祿當時擔任內務府大臣，每天供奉內廷，可以親眼看到皇帝。榮祿告訴他皇帝前一天晚上並沒能睡好。榮祿的話佐證了他對皇帝病情的看法，翁同龢對此感到憂心忡忡。<sup>42</sup>

翁同龢早就覺得李德立的用藥頗有蹊蹺。如今皇帝顯然離康復還頗有一段距離，然而醫生卻居然沒有開藥方。這個奇怪的現象更加深了他對李德立的疑慮。他回家之後自己翻閱有關天花的醫書，然後抄了一些有關痘後調養的藥方。第二天交給李鴻藻。希望李鴻藻向皇太后或皇帝報告。李德立可以參考這些藥方給皇帝更好的治療。<sup>43</sup>

其實李德立在這一天是給了藥方的。脈案中所有的病徵均不嚴重。<sup>44</sup> 決定不公開脈案或許是當政者而非醫生的決定。繼續公開脈案與才剛宣布痊癒似乎是有著點矛盾。

皇帝的健康狀況並未在痘神娘娘離去後有顯著的改善。就從送神離開的那天起，皇帝告訴醫生他的腰部痠疼。這個毛病越演越烈。到了十一月十九日，腰部出現了兩個膿瘡。關此李德立只提到有皮膚潰破流出膿水，並未具體描述。然而這兩個膿瘡似乎來勢洶洶，第一天他就開了大量的外治藥：多至五十張治膿瘡的膏藥『拔毒膏』以及三盒一兩的油膏。<sup>45</sup>

皇帝的病勢惡化得很快。十一月二十日，肩膀、胳膊等處上都長出新的膿瘡。

---

<sup>42</sup> 《翁同龢日記排印本冀排印本附索引》，頁 763。

<sup>43</sup> 前揭書，頁 765。

<sup>44</sup> 《清宮醫案研究》，頁 1356。

<sup>45</sup> 前揭書，頁 1358。

儘管在李德立急忙搶救之下，這幾個新的膿瘡馬上就消除，但是腰部的那兩個仍然未能全愈，仍然不斷流出惡臭的膿水。為了止膿以及補充因膿水消耗的元氣，李德立又完全回復到先前採取的溫補。這個療法叫做『托裡化毒』，是中醫應付這種毛病的典型策略。在十一月二十二日翁同龢記載他從內務府朋友那兒聽到皇帝的病況。大體上在李德立控制之下，皇帝的精神興致都還不錯，只是『腰間二小穴，一流水一乾，略不便。』<sup>46</sup>

十一月二十三日，翁同龢晤訪李、莊兩位大夫探詢皇帝的病情。醫生終於承認皇帝的病情比脈案中寫的嚴重得多。他們剛做的改變藥性的試探結果是失敗的。皇帝腰部的膿瘡已經從『小穴』變成『外潰則口甚大』，『內潰則不可言』。

<sup>47</sup> 御醫對於接著該怎麼醫療感到『意甚為難』。他們表示當前唯一能做的就是繼續用『保元』、『托裡』的方法治內；用藥膏治外而已。晚上翁同龢去拜訪李鴻藻，問請他轉交給御醫的痘後藥方有何下文。李鴻藻告訴他太醫看了看藥方，只告訴他這些他們早已經知道了，而且露出一副很不耐煩的樣子。<sup>48</sup> 顯然御醫並不把翁同龢的意見當作一回事；而翁同龢對御醫的不滿也在逐漸升高。

除此之外李德立還有別的地方讓他覺得不放心。在十一月二十五日的脈案中他宣稱溫補療法實行以來，幸而並未產生過類似便秘、口渴等副作用。這樣的描述似乎是說皇帝的病情似乎有好無壞。然而實際的情況是御醫前一天處方了大量有通便作用的車前等藥材，讓當天帝小解多達十餘次、大解也有三次。這種把頻便美化成是『沒有便秘副作用』的說法，讓翁同龢非常憤怒。他第一次在日記中強烈地指出他對於脈案的內容『頗不謂然』。<sup>49</sup>

這時李德立已經感受到周圍的壓力。在次日的脈案中開始出現了更露骨的自我防衛式詞句。他們堅持溫補托裡的療法有絕對的必要，至少「庶不耗腎元」。這似乎是在回應若干攻擊御醫療法的言論。儘管如此，他也不能不承認當時每天

---

<sup>46</sup> 《翁同龢日記排印本冀排印本附索引》，頁 766。

<sup>47</sup> 當天的脈案只說膿汁『不減』。《清宮醫案研究》，頁 1360。

<sup>48</sup> 《翁同龢日記排印本冀排印本附索引》，頁 766。

<sup>49</sup> 前揭書，頁 767。

從皇帝腰裡流出的膿水多達『一茶盅有餘』，『恐傷元氣』。皇帝的病情的確是在惡化中。

到了這個時候慈禧覺得自己不能再坐視。她開始積極插手皇帝的醫療決策。為了給李德立適度的壓力，二十六日她下令兩個李德立的屬下李德祥和韓同九單獨診視皇帝。<sup>50</sup>然而，二人的診斷與其長官相當一致，所開的藥方也大致相同。如此過了兩天之後，慈禧發現這個法子毫無用處，仍然責成李德立妥善治療皇帝。<sup>51</sup>

流出的膿汁似乎真的讓皇帝元氣大傷。十一月二十七日翁同龢從服侍皇帝的張太監那兒聽說皇帝幾乎整天都躺著休息。起坐的時間極少，而流的膿汁越來越多，皇帝的精神狀態『殊委頓也』。<sup>52</sup>當天的脈案則寫著皇帝的『漿汁未減，氣穢如昨』，腰臀部的肌肉在長久為膿汁浸淫之餘已呈現「漫腫」的慘狀。除此之外，還增加了口渴的新症狀。<sup>53</sup>

口渴這個症狀完全未引起翁同龢的注意；但是對李德立來說，這個看似普通的事卻像是最可怕的警訊。十一月二十八日李德立對於皇帝的療法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當天翁同龢在內奏事處遇見了李德立、莊守和兩位御醫，並詢問皇帝這兩天來的光景。他們回答：

腰間潰處如碗，其口在邊上，揭膏藥則汁如箭激。丑刻（凌晨一至三點）如此，卯刻（午前五至七點）後揭又流半盅。前進溫補並未見效，而口渴作嘔，萬一陽氣過旺，陰液不生，誰執其咎？今改用涼潤法，但求守住徐看，實無把握。

翁同龢接著問是否應用人參。他們答道數日前已經想到過，但是因為『恐風聲過大，且非兩宮聖意』，最後決定放棄。翁同龢又追問了許多今日開方的細節。三人談了很久。翁同龢說御醫的話雖多，「大略多游辭也」。翁同龢隨後讀了放

<sup>50</sup> 李德立的曾孫李志綏在回憶錄中曾提到李德立有一個行四的弟弟同時供職於太醫院。其英文版原本中並未提到這個人的名字，但中譯本則確指這個李德立的四弟名為李德昌。所以此處李德祥似乎只是名字與李德立偶似，與李德立並無上司與部屬以外的關係。見李志綏《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台北，時報文化，1994），頁14。

<sup>51</sup> 同上；《清宮醫案研究》，頁1362-1363。

<sup>52</sup> 《翁同龢日記排印本冀排印本附索引》，頁767。

<sup>53</sup> 《清宮醫案研究》，頁1362。

在內奏事處的脈案。他注意到前一天早上的方子還是維持過去十天溫補托裡的基調，到了晚上另開一方，卻大量裁減原先的君藥黨參、黃耆的分兩。並在當天的脈案裡一反前幾天堅持溫補的論調，說是不敢過用溫補。這是李德立第三次明顯改換他的治療路線。翁同龢對於李德立對口渴似乎是過當的反應感到不可思議，當天的日記裡他再度評論李德立的藥方『不可解也』。<sup>54</sup>

慈禧此時覺得事態嚴重。二十九日午前八點鐘她召集大臣討論皇帝的病情。慈禧淚流滿面問諸大臣可有良法救救皇帝。翁同龢首先發難表達了他對御醫的不滿，提議當務之急是要覓得良醫。榮祿接著進言他知道有一位高齡八十九歲的老醫生祁仲，治外科甚有療效。慈禧同意一試。在等待祁仲入宮的空檔，慈禧讓群臣再度入內殿探視皇帝的病狀。這時翁同龢看到皇帝側臥在床上，御醫在旁搗膏藥擠出膿汁。當時膿已有半盅。色白而微紫，氣味腥臭，四周的肌肉漫腫成一大片。翁同龢的感想是『視之可駭』。<sup>55</sup>

祁仲約在午前十一點左右抵達。在半個小時的診斷之後，他告訴慈禧也許有辦法可以治好皇帝的病。他所開的藥方是十全大補湯，一副人參份量極重的方劑。只經過短暫的考慮慈禧即宣布她決定仍然把責任交給李德立，祁仲的方子則存檔不用。翁同龢對於這個結果似乎十分失望。對於李德立所開的藥方，他唯一的評論是『一派涼藥也』。<sup>56</sup>

十一月三十日又有新的症狀出現。皇帝的牙齦、臉頰均開始浮腫起來。李德立對此所做的解釋是皇帝體內的陽氣過旺所引起，所以仍應維持涼藥。當天一晝夜皇帝大解竟多達二十一次，讓翁同龢覺得『頗駭物聽』。<sup>57</sup>

別的大臣至此也頗懷疑李德立的本事。國丈崇綺（1829—1900）無法信服李德立最近使用涼藥的主張。他認為應該用肉桂、生薑等藥溫補，並於十二月一日將自己的意見上奏太后。當他下朝時他遇見李德立。李德立告訴他現在皇帝經過

---

<sup>54</sup> 《翁同龢日記排印本冀排印本附索引》，頁 767。

<sup>55</sup> 前揭書，頁 768。

<sup>56</sup> 前揭書，頁 768。

<sup>57</sup> 同上。

昨天一番洩瀉，排出體內餘毒，他已經確有把握，並請崇綺毋庸再管該不該用薑、桂的問題。<sup>58</sup>

至少傳聞中皇帝的病情是好轉了些。十二月二日翁同龢從太監那兒聽說皇帝的病頗有起色。皇帝已經在多日躺在床上養病，前一天晚上精神、興致都很好，甚至可以坐起來閒聊了。當天午前九時許慈禧再度讓群臣進內殿謁見。皇帝才剛醒來。翁同龢走近御榻仔細觀看。他看到皇帝的兩頰、嘴唇都腫得很厲害，但目光還算是明亮的。皇帝躺在榻上只說他現在不想吃東西，還想睡覺。<sup>59</sup>

翁同龢隨眾離開內殿之後，又遇見了御醫。翁同龢追問皇帝的狀況究竟如何。李德立這才透漏他最擔心的是會演變成幾乎是絕症的走馬牙疳。<sup>60</sup> 要預防這個結果溫補的藥是絕對禁止的。前幾天用瀉下法已經清除了部分體內餘毒，只有繼續用這個辦法才能有轉機。翁同龢匆匆看了今日的藥方，看到今天用了治胃的葛根等藥。以他對醫學的理解他無法對此作出合理的解釋。在日記裡他寫著『不可解，不可解』。<sup>61</sup>

另一位大臣孫貽經（1827—1909）已經忍無可忍，於十二月初三上奏建議廣求名醫代替李德立。同日慈禧召見南書房諸臣與軍機大臣一起與御醫在御前辯論治療是否得當。面對諸多強烈的質疑，御醫卻總能提出理由說明自己正確無誤。眾人始終無法反駁御醫的論點以改變其既定的療法。關於這個結果翁同龢的解釋是御醫的口才『甚辯』。<sup>62</sup> 反對御醫看法之意溢於言表。

十二月二日李德立私下告訴過翁同龢最壞的結果是演變成走馬牙疳，但他並未向翁同龢解釋這個病的致命性，也未曾把這個可怕的病名形諸文字。到了四日李德立發現皇帝終究染上了這個疾病。在束手無策之餘，他提出了這個病名，而

<sup>58</sup> 同上。

<sup>59</sup> 前揭書，頁 769。

<sup>60</sup> 由於感染此病的患者多半在一二日之內就死亡。病勢凶險，有如奔跑之馬的猛烈快速。故名。見謝觀《中國醫學大詞典》（台北：商務印書館，1988），頁 1389。

<sup>61</sup> 《翁同龢日記排印本冀排印本附索引》，頁 769。

<sup>62</sup> 同上。

且在脈案最後寫下他會『竭力調理』，暗示皇帝的病已經到了最後階段。<sup>63</sup>

十二月五日諸大臣議論紛紛，都是在討論皇帝的病情。下午翁同龢在家中忽然接到緊急通知召諸大臣到養心殿西暖閣見太后。當眾臣同入的時候，李德立正在向太后做緊急報告。翁同龢此時已顧不得儀制，當著太后的面怒斥李德立問他為什麼不快用回陽湯救治。李德立回答現在能用的只有麥參散而已。<sup>64</sup>躺在東暖閣的皇帝此時已經昏迷不醒，翁同龢就命李德立立即把藥灌進皇帝嘴裡搶救。此時太后泣不成聲。隨即有一個御醫進西暖閣報告皇帝的牙關已緊得無法灌下湯藥。諸臣立奔東暖閣探視皇帝的最後一面。翁同龢記載同治皇帝最後一份脈案中寫道『六脈俱脫，酉時（午後五至七時）崩逝』。與病魔纏鬥了三十七天之後，同治皇帝終於得到了解脫。<sup>65</sup>

## 討論

長久以來同治皇帝的病例一直吸引著學者的談興。<sup>66</sup> 到目前為止幾乎所有的討論都是圍繞著這個問題打轉：他究竟是死於天花、還是梅毒？<sup>67</sup> 在1990年清宮醫案公諸於世之前，其實很少人相信官方說法他是真的死於天花。<sup>68</sup> 既然政府已經在十一月中旬正式宣布了同治皇帝的天花已經痊癒了，又改口說他是死於天花

---

<sup>63</sup> 《清宮醫案研究》，頁 1368。

<sup>64</sup> 麥參散為人參、麥冬、五味子三味藥材組成。因音義諧稱生脈散，謂可讓脈搏起死回生。為清宮醫療搶救病人生命的最後法寶。見陳可冀〈清宮瀕臨死亡者生脈散之應用〉，《清宮醫案研究》，頁 2237-2242。

<sup>65</sup> 《翁同龢日記排印本冀排印本附索引》，頁 770。

<sup>66</sup> 除了學者之外，同治皇帝患病的真相也曾引起當時國際間關注。如 1875 年十月二十一日美國的紐約時報就曾評論同治皇帝的死因是『神秘』的。

<sup>67</sup> 除了天花與梅毒之外，還有種種其他的說法。如民間有人傳說他是死於『疥瘡』，也有人說他是因為天花治愈後調養期間房室不節而死的。此外，美國學者 Sterling Seagrave 則懷疑他是死於謀殺。見 Seagrave, *The Dragon Lady*, (New York: Vintagebooks, 1992) p. 138。

<sup>68</sup> 少數的例外都是有機會能在北京故宮親見故宮檔案的學者，如吳相湘和金梁。吳相湘見前引。金梁見其所著《道咸同光四朝異聞》（台北：中華書局，1970），頁 6。

實在不能叫人不起疑。<sup>69</sup> 此外，人們知道在清末北京歡場感染梅毒的比例是出奇的高。<sup>70</sup> 這兩點一湊合，相信同治常微服出巡聲色場所的學者們，就很自然地結論梅毒才是同治皇帝真正的死因。<sup>71</sup> 儘管他們都曾讀過翁同龢親眼見到同治天花症狀的證詞，他們總是用翁同龢『為尊者諱、為親者諱』之類的理由加以解釋，認為翁同龢不願意將自己皇上門生的醜行形諸文字。<sup>72</sup>

清宮醫案的發表革命性地改變了學者的看法。根據醫案內容，檔案的編輯小組直斥同治死於梅毒的說法是毫無根據的。<sup>73</sup> 吳相湘早先宣稱同治死於天花的看法終於得到了迴響。<sup>74</sup> 以第一手文獻為依據，編輯小組高度肯定翁同龢日記內有關同治病情記載的字面意義。學者的視聽也為之轉移。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史家宣稱他們同意同治是死於天花。<sup>75</sup> 儘管如此，關於所謂『同治死因之謎』的爭議仍未就此塵埃落定。至今兩邊的學者仍然相持不下，各自想辦法找新的論點來支持他們的看法。

然而，雙方學者的焦點都放在哪種史料可信以及如何詮釋字面意義等難以得到定論的問題上，對於其立論的基礎則似乎未加深考。比如說，認為同治死於梅毒的學者毫無異議地同意同治之所以得到梅毒是因為其涉足娼寮；而絕大多數的

<sup>69</sup> 宣布同治皇帝的天花已經痊癒的上諭全文可見於《萬國公報》，卷一，頁 547。就一個人一生只會得一次天花的前提來看，這點或可解釋為何學者始終傾向於懷疑官書的說法是有所隱諱。

<sup>70</sup> 根據服部宇之吉(1867-1939)1907 年在北京的調查報告，估計有百分之八十的北京年輕男子染有梅毒。見服部宇之吉《北京志》之漢譯本《清末北京志資料》(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4)，頁 652。

<sup>71</sup> 其中代表數蕭一山。在其名著《清代通史》中，蕭再三強調同治皇帝就是死於梅毒。見《清代通史》，頁 670-674:905-907。1990 以前少數同意同治微服出遊而認為他是死於天花的學者據知只有吳相湘一人。見吳相湘《清代宮廷紀實》(台北：正中書局，1988)，頁 192-205。

<sup>72</sup> 如莊練〈同治與光緒〉，收在莊練《中國近代史關鍵人物》(台北：文星書局，1968)，頁 45。

<sup>73</sup> 徐藝圃〈同治帝之死〉，《清宮醫案研究》，頁 2253。

<sup>74</sup> 吳相湘〈天花與御醫〉，《晚清宮廷與人物》，頁 45。

<sup>75</sup> 較著的例子為幾位年輕的大陸學者的論著，如徐立亭《咸豐帝、同治帝》(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頁 406；劉耿生、王丹〈同治、光緒皇帝死因之謎〉，《歷史月刊》89(1989)，頁 84-89。

史料歸結他涉足娼寮是同治十二年大婚後慈禧干涉房帷的結果。<sup>76</sup> 既然如此，則同治死前即使真的得過梅毒，病史不過一年。而據現代醫學知識，如果是單純的梅毒須得五年以上才可能致死。而且在死前須先經過三個發展期。<sup>77</sup> 這些條件同治都不符合。就算沒有清宮檔案作為反證，主張同治死於梅毒的論點本身也很難站得住腳。

另一方面，主張同治死於天花者的論點也有其弱點。天花與梅毒的病原在人體內並不互斥。證明了一個人確實得了天花並不代表他並未感染梅毒。所以僅用清宮檔案與翁同龢日記的天花症狀描述並不足以否決同治得過梅毒的可能性。天花論者中似尚未曾有人想過醫學知識本可以輕易擊倒同治『死於梅毒』立論基礎而取得勝利，卻大費周章地請了現代醫生來支持清宮醫案內容合理以強化其論點。只是在這些醫案是怎麼寫出來的、又有多可信的問題尚未解決之前，現代醫生的背書仍不足以給這個爭議下最後的結論。認為醫案以及翁同龢無論如何不可能承認皇帝的醜聞自有其合理之處，否則不會支持學者的看法這麼久。何況，又有一些其他目擊者提出與醫案相反的證言。<sup>78</sup>

在1954年與1994年，李德立的兩個曾孫李鎮及李志綏分別發表他們得自家傳的密聞。儘管在細節上有些差異，二人異口同聲地說李德立親口證實同治確實死於梅毒。他們都說當慈禧聽到李德立的診斷結果後，強迫他要宣布是天花、而且要用天花的方法醫治。而就是因為藥不對症才導致同治死亡。<sup>79</sup> 如果脈案的作者自己否決了所寫的脈案是可信的，我們是否應該無條件地相信其內容呢？如果說李德立是為了給自己沒能醫好同治而找藉口才否定自己簽名的脈案，這點應該不難想到，為什麼大家就這麼相信他的一面之詞呢？何況其他沒有責任的太醫院醫

<sup>76</sup> 唯一記載同治在大婚前即已微行的史料是費行簡所著的《慈禧傳信錄》。但是即令如此而謂同治於大婚前早已感染梅毒，其病徵並不支持其梅毒已到可讓人致死的末期。

<sup>77</sup> 高丹楓、劉壽永《古今性病論治》（北京：科學出版社，1993），頁42。

<sup>78</sup> 讀過新出版的清宮醫案但仍堅信同治死於梅毒的學者不乏其人。如徐徹，《慈禧大傳》（瀋陽：遼瀋書社，1994），頁58；左書譚，《慈禧太后》（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頁169。

<sup>79</sup> 李鎮〈同治究竟死於何病〉，《文史哲》（濟南）（1956,4），頁69-70。Li Zhisui 李志綏, *The Private Life of Chairman Mao* (New York: Random House), p.21。



生事後也有人出面說同治死於梅毒。<sup>80</sup>關於這些問題，堅持以檔案為標準的學者還沒能提出令人滿意的答案。這顯示了這些學者幾乎是無條件認定脈案的字面意義足以充分反映客觀事實。毫不考慮醫生可能會在脈案中隱瞞或歪曲事實。當然，另一邊的學者也不免只因為耳食就把脈案一筆抹煞，彷彿李德立從頭到尾捏造一份毫無事實根據的病歷。雙方對於脈案史料價值的看法都是黑白分明的可靠或不可靠。既少有人想到灰色的可能，也似乎未考慮過黑白系以外色調的餘地。

要檢證脈案內容，翁同龢的日記無疑是最重要的史料。翁同龢所引用的脈案內容，可說與今日宮廷檔案完全符合，至多只有少許文字上的出入。主天花說的學者，也常引翁日記中其親眼觀察到的病徵，加強其說的份量與脈案可靠性的依據。<sup>81</sup>似乎把翁同龢的日記、李德立寫的脈案、與實際上的情形三者視為一致。

由前敘故事我們知道這樣的假設並不能成立。首先，李德立所認知的皇帝病情通常比脈案嚴重些。十一月二十三日與十二月二日兩次他告訴翁同龢的話都透露了若干當天脈案裡未曾明言的病狀。

其次，由於翁同龢日記的幫助，我們可以明確指出李德立在寫脈案的時候常運用修辭的技巧。如十一月二十三日把膿瘡惡化說成是『膿汁不減』。十一月二十五日把頻便說成是沒有便秘的後遺症是一個較極端的例子。翁同龢很清楚李德立在玩弄文字。但是他或許誇張，卻沒有說謊。翁同龢也無法否認醫生該盡力預防溫補法所可能造成的便秘。他縱使不滿，也無法就脈案的文字讓李德立入罪。

就像這樣，李德立在落筆前是經過深思熟慮的。他對於病勢的描寫多半不盡、但又不能說是不實。此外，作為一個醫生，他本有若干自由決定諸徵候間孰該重視、孰該忽略。他也充分利用了這自由幫助他在徵候（如通便）、治則（如預防便秘）、處方（車前等藥材）之間始終保持著合理的聯繫。所以李德立總可以面對種種挑戰，反對他但醫理遠不如他精通的諸大臣說什麼也挑不出他的錯處來。

學者們由於太專注於同治是否得了天花這個問題，所以在閱讀同治脈案的時

<sup>80</sup> 莊練轉述唐魯孫得自光緒、宣統間太醫院院使張仲元的說法，張仲元自稱當時眾醫中只有他一人提出同治所染實為梅毒。見莊練〈同治與光緒〉，《中國近代史關鍵人物》，頁45。

<sup>81</sup> 徐藝圃〈同治帝之死〉，《清宮醫案研究》，頁2255。

候，總是以徵候為起點，最多再尋求治則與藥方是否一致。只要這些都與天花若合符節，就算完成了研究的目的。這樣的方法雖然不能說是有錯誤，但是卻可能有盲點。依據以上的討論，學者循著脈案的文理而得到彼此一致的結論毫不出奇。這正是脈案的作者精心希望達到的目的。

翁同龢閱讀脈案的視點與當代學者迥異。他最注重藥方內容；徵候則放在其次。幾次他推敲良久後卻仍『不可解』的都是用藥。身在宦海他明白不必深信脈案裡的徵候與治則。醫生若是預先決定了方針要用某種藥，他可以任選一種合於此藥療效的徵候予以強調，再透過解釋治則來讓他的療法合理化。<sup>82</sup>在不捏造徵候的前提下他有相當大的彈性。所以要想察覺病情最有效的方法是看他的藥方。藥方直接說明了醫生所想達到的效果。翁同龢當然並未完全忽視脈案裡所寫的徵候，只是他總會多方用親眼觀察或小道消息來決定哪些所寫的徵候確實也值得他重視。兩者配合下他構建出他所理解的病情，這個病情其實與脈案中所描述的病情常存在著一段差距。他所理解的病情再加上其自修後對醫理的知解，他有時也有其心目中的治則。而當其心中的徵候與治則和醫生所開的藥方有所不符，也就是他覺得脈案『不可解』的時候。

是故，翁同龢日記之所以能有力支持脈案的所謂『可信性』，不是因為其部分內容一致，而是因為彼此之間角度的對立。翁同龢一直懷疑脈案背後有什麼玄機。但是就皇帝得了天花這點他不覺得有什麼可挑剔之處。然而脈案與翁同龢日記除了均肯定了同治得了天花這點外，內容與性質其實都相當不同。脈案顯然不如許多現代醫生所假設的那樣，是一個所謂報告客觀事實的病歷。與其說是事實報告，不如說是官僚文牘更為貼切。作為一個朝廷命官，太醫院的醫生需要有一種公文來報告他們的工作。他們的督導者，包括皇室與大臣，在其任務達成或失敗之前，就是用這公文的內容來評估其績效。所以脈案寫作與醫生的榮辱成敗關係重大。除了自我辯護的需要外，脈案也得能減低上級在醫療過程中施予壓力。所以病情描述多低調處理以免過早引起朝野疑懼。連用藥都得考慮同樣問題而避

---

<sup>82</sup> 據專研清代法律的 Matthew Sommer 教授指出，刑案的寫法也有非常類似的情況。審判者常常先決定了要判什麼罪，然後再用刀筆手法，輕重其事。

免人參。由於脈案的文字有著麼多的講究，所以翁同龢才需要到處去打聽內幕。因為他根本就是將脈案當作官樣文章來看待。如果翁同龢沒有留下他寶貴的日記，許多真相將永遠石沈大海。

如果說翁同龢日記讓我們了解了脈案與事實的差距，那麼翁同龢的記錄是否就可視為準則呢？未必如此。由於翁同龢個人不肯同意同治的天花已經痊癒，所以拒絕把十一月十五日向天下昭告『諸臻康吉』這件事記入日記。這不但讓學者對於事件的來龍去脈有了錯解；而且也因此讓痘神娘娘的儀式的象徵意義隱晦不顯。此外，翁同龢從太監那兒聽來的小道消息有時與脈案衝突。也未必就是太監的傳言可靠。何況，翁同龢也有他的盲點。他知道自己的醫理不足但是他仍勇於以其有限知識譏評醫生。他的意見未必正確。對於翁同龢日記內容對於記聞與意見必須有所區隔。依照翁同龢的意見來評價脈案的內容也是一種偏頗。

十一月二十八日至十二月五日的病情發展可對此說提供旁證。現代的醫師讀過同治的脈案後，結論同治最終致命疾病既非梅毒也非天花，而是天花預後常見的變症走馬牙疳。<sup>83</sup> 如李德立所判定者。關於這點翁同龢也沒有什麼異議。而當李德立在十一月二十八日發現了口渴的新症狀的時候，他毅然否定先前堅持的溫補路線，翻轉到可說完全相反的涼潤療法。這個決定立即引起了太后及眾大臣的疑慮與『不可解』，也給了李德立很大的壓力。其實李德立在二十八日當天就跟翁同龢暗示過下場可能不可收拾，但是翁同龢一直到同治死去似乎都不曾真確理解天花預後期口渴這個徵候所可能帶來的災難。他也對李德立在治療同治時粉飾脈案背後曾付出的一付苦心毫無所知。

以中醫學的解釋，走馬牙疳的起因是積溫成熱，久後鬱結的熱氣經由經絡上傳牙齦引起腫脹。要壓抑這熱氣，唯一可行的方法是使用涼藥退散熱氣。以此觀點而言，李德立幡然轉換由溫補轉換成涼潤可說是最為病人著想的做法，因為可以儘量避免導致號稱為『死症』的走馬牙疳的可能性。任何溫補的藥物都可能隨時造成不堪設想的後果。<sup>84</sup> 李德立毫不猶豫自毀前幾日不肯退讓溫補療法的立場，

<sup>83</sup> 徐藝圃〈同治帝之死〉，《清宮醫案研究》，頁 2255。

<sup>84</sup> 上述說法可見《醫宗金鑑》，頁 1519。至於有關走馬牙疳的描述，鑒同揭書頁 1715。以

改採幾乎全反的涼潤法，而且不顧嫌疑地強行用洩瀉方式試圖儘快排除同治體內熱毒以減低變成絕症的可能性。李德立已經用了當時條件下最尖端的醫學試圖保住皇帝的一條命。他的苦處是他不能太早發佈皇帝可能發生的致命危機，也不能充分解釋他的用意。翁同龢始終不諒解他、也未曾真正理解過他的用心有多深。而學者大多借助翁同龢觀點來看這場病，總認為他的醫術平庸、浮滑推諉，鮮有人對他抱過同情的態度。

李德立的立場十分艱苦。他在試圖醫好皇帝卻周圍不諒解的情況與屈從輿論而坐視皇帝死亡間選擇了困難且受責重者。要達成最後目標他先得要突破重重外行人的干涉，以避免慈禧起意決定採納任何外行人的溫補意見會讓他的努力毀於一旦。一直到十二月四日李德立確認皇帝得了非他力所能及的走馬牙疳他才放棄努力。李德立不是神醫。他沒法子治好一切疑難雜症。但他有一定的學問根柢，也忠實地依照了當時的醫學典範作出最大的努力。他大膽機敏、堅毅而肯為病人犧牲。其品格也具備了良醫的素質。評價醫史人物以成敗論英雄非但不公平，而且也會妨害對醫療本身正確的理解。

當然，本文的宗旨並不是為李德立平反翻案。分析李德立的醫道的目的，首先是要展現醫療絕非單向醫者施予、病者接受的關係。醫療的過程是如同奕棋般由雙方互動來進行。除此之外還有一班觀棋者在旁指指點點推移著棋局。醫生應付的不只是病人的病，還包括病人這個人乃至其人際網絡。在這個局面下反觀作為溝通重要媒介的脈案，我們既不能遽指其作偽，也難以首肯這就算實錄。因為其底蘊本來就不是回答了其是真是假這般黑白判然的是非題就能道盡。脈案是醫生的工具。其性格必須夠複雜才能應付宮廷醫療中各式各樣的問題。脈案記錄下來的也不只是病人的病，還包括醫生對病人乃至周圍各種意見、目光的反應與折射。藉由醫、病互動的視野，我們看到了所折射出來的是一個多彩的光譜。